

【步履寻章】



百分之九十八的确定感

□闫红

假期儿子去北京参加音乐节,我送他到机场。他下车时,我本能一问:“有没有带身份证件?”但见他脸色有变,答案不言自明。

回家拿已经来不及,我让他先去办临时登机证明,我飞驰回家。一个多小时后,我重返机场,沿着长长的托运行李的队伍,一一问过来:“请问您去北京吗?”人家连连摇头。

我要是碰到这么冒昧又可疑的发问,就算去北京,也会说不去。不是说他们都撒了谎,有个姑娘还把登机牌翻给我看,说她去拉萨,深为不能帮到我而感到可惜。还有一家三口同样忘带了身份证件,也是办了临时登机证明,他们热情亲切地告诉我,可以在手机上办电子证照,需要身份证件时出示那个证照就可以了。

看到别人也会犯同样的错,我略感“安慰”。我又联系认识的快递小哥,他说今天发快件明天能到北京。两相结合就是孩子明天就能拿到身份证件,落地后不会流落街头了。比较麻烦的是下午的音乐节,不知道能不能进去。当然,音乐节现场也许有人工通道。万一没有,让他长长记性也是好的,都是人生里的合理耗损。

说是这样说,还是希望第二次独自出门旅行(第一次是南京)的他顺顺当当。我点开手机里的APP,发现里面除了有身份证件电子证照,还可以添加“身份证件网证”,这个网证点开后有个二维码,在很多场合可以直接当做身份证件使用。

我远程指导孩子将“身份证件网证”添加进去,听他顺利住进了酒店,到了音乐节现场,方才放下心来。

我跟他说:“多拍点照片。”他没有回复。如果你有个刚上大学的儿子,你会知道这很正常。这是下午四点多,然后我就忙别的事去了。

这一天我跑了两趟机场,又有各种担心忧虑,中午也没睡好,到了晚上八点多,已经疲惫不堪。睡觉前我刷了一下抖音,刷到那个音乐节,但见现场人山人海,挥舞的手臂如浪涛般起伏。嗨是挺嗨,但一个没有身份证件的年轻人,又置身于这样复杂的场合,实在让当妈的人难以放心。我想还是给他打个电话再睡吧。

这一打不要紧,居然关机了。他不可能主动关机,他心心念念想参加这个音乐节很久了,来的不少歌手他都很喜欢,肯定要录视频的。

要么就是没电了?也不可能。据我对他的了解,他在别的事情上也许不上心,这次他肯定会充满电再出门。我发最后一个消息时他进场没多久,他后来没回复,不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没电了。

那就是手机丢了,捡到的人关了手机。目前看,这种概率最大。丢了手机为什么不联系我呢?可能想看完音乐节再说。我的天哪,没带身份证件,又丢了手机,接下来怎么办?这还不算最糟的,最糟的会是什么样?我也不知道,正因为未知,有了模糊而广阔的恐惧。

我一遍遍拨打他的电话,一遍遍刷新他的“微信运动”,一遍遍给他酒店房间打电话——明

知道他不可能在房间,没有任何进展。我想着明天是不是要飞一趟北京,又感觉不会这么倒霉,是的,此刻我还算保持一丝理性,怀疑恐惧被我放大了。

两个小时后,我终于拨通他的电话,他自然是好好的。手机开了飞行模式,他估摸着今晚要录比较长的视频,认为开启飞行模式可以省点电。

我非常生气,说,你开飞行模式之前完全可以发个消息告诉我一下。他说,啊?我没觉得参加音乐节是个多大的事,如果我在家,去图书馆了,你联系不上我,会这么担心吗?

这没有可比性好吗?我继续生气且无语,不想再跟他说下去了。

第二天,他给我发了个消息,问我昨天是不是特别着急。他说他昨天特别开心,一直跟着唱,跟着喊,嗓子都哑了。后来步行回酒店的,走了几公里都不累,有些事情就没有顾及到。

看他这么说,我忽然觉得很抱歉。人生难得几回嗨,当他那么开心地回酒店,被我劈头盖脸地一通数落,真的很扫兴啊。

而且,当时真的有那么严重吗?我扪心自问,我的理性并不这么觉得,我那么着急,是因为我一向对于确定性要求太高使然。这么说吧,一件事,正常人可能觉得有百分之八十五的确定就够了,我可能会上调到百分之九十八。

这几年我陪读,白天在自己家,晚上在出租房,我每次离开一所房子去另一所房子时都要检查上一千遍一万遍。屋里屋外各装一个摄像头,不光防贼,也是看门有没有关,灶头的火有没有灭——有一个是装在厨房里。

我不觉得这是强迫症,实际是来自于深切的不信任感。应得的东西,还没拿到手,我是不会算到自己的资产里的。我不愿意借钱给别人,同样,我不想让别人也这般担心,也不愿意跟人借钱。

我厌恶风险,至今不会炒股。买过几次基金,有一点亏损我就赶紧卖掉。所以我的基金基本都是亏那么一点点,确实,很少,但这意味着我根本不可能从风险投资中赚到钱。

我对于确定性的过高要求让我只愿意做有把握的事,否则就会紧张、不安、动作变形。我一直停留在舒适区大概就是这个原因,想要确定,就不可能有大幅突破。

历史上的英雄都是敢于拥抱不确定性的人,有了弯道超车的可能。不要畏惧不确定性,敢于想象在不确定性中受益,也是普通人的必修课。

所以,我这样回复儿子,当时是有点着急,不过现在觉得大可不必。你看我们这次获得多少新的体验,知道世界的容错率比我们以为的大,不那么确定也没关系。

在这场小小的风波里,我似乎也完成了一次内心的“系统升级”。那些为“百分之九十八的确定”所付出的紧张与耗损,或许真的可以放下一些。

育儿就是一次再世为人,即使目送他渐行渐远,也还是会随着他的脚步进行内心的修炼。

□冯连伟

爹去世的时候,娘只有63岁。

爹是在食道癌手术后8个月去世的。从爹出院到去世,在这200多天的时间里,昼夜照顾爹的人,正是娘啊。我和大哥都在城里工作,两个姐姐和二哥家里都有地要种,只能隔三差五地回家看看。即使这样,每次我们回家,娘都要亲手做饭给我们吃。都说“百日床前无孝子”,都知道侍候病人的辛苦,而娘当时也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,是她承担了我们当儿女应尽的义务啊。

记得给父亲送完殡的第二天,娘把我们都叫到跟前。娘说:“你爹走了,按我们的风俗,你们要守七到上了五七坟。但你们还要上班,工作不能耽误。有我在家里,你们都回去吧,到上五七坟的时候来上坟就行了。将来我死了,你们也不用回来守七,到时给我亮着灯就行了,亮着灯我就不怕了。”

爹去世20多年后,娘没能成为我们祝福的百岁老人,带着我们的爱与不舍走了。给娘送完殡后,我们把老宅的灯从室内到院外全部都开着。

一直到上五七坟之前,我都是利用周末的时间回去给娘“守七”。我依然把车停在老宅门前,可大门前看不到坐在马扎上盼儿归的娘了,听不到那嘘寒问暖的娘的声音了;再也没有让我牵着手一起走进屋的娘了,再也没有问我一声想吃什么饭的娘了。

堂屋的地上堆满了麦瓢,墙上摆放着娘的遗像。那是娘80周岁生日时的照片,照片上的娘是那么慈祥。记得娘80岁生日那天,全家人几十口都围在娘的周围,欢聚一堂,娘是那么快乐,全家人如同过节一样热闹。可那已经是无可复制的旧时光了,我孤孤单单地面对着遗像上的娘失声痛哭。

娘晚年时都是独自生活在老宅里。我和媳妇每到周末都回老宅陪伴娘,吃完饭主要是陪娘聊天,听娘讲村里发生的新鲜事,听娘讲她当村干部时发生的让她刻骨铭心的事,听娘讲她嫁到冯家七十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。娘总有说不完的话,有一次,晚上十点钟了,我对娘说:“娘,咱睡觉吧。”谈兴正浓的娘有些失望,又不甘心地问我:“你困啦?”我感觉娘还想继续拉呱儿,我赶快说:“不困,不困。”可娘还是疼儿啊,担心影响我第二天工作,娘又说了几句就站起来让我去睡觉了。现在想起来,我的肠子都悔青了。

我总忘不了娘活着时千叮万嘱的话:“酒不是饭,喝多了伤身子,少喝啊!”

记得有一年春节回家,在大姐家和几个外甥女婿喝酒,经不住他们兄弟四个轮番敬酒,喝得我昏昏然不知所以然,把老娘千叮万嘱的话丢到了爪哇国去了,吐得一塌糊涂,被扶到床上睡着了。娘在家里那个着急啊,一遍又一遍给大姐打电话。一向在娘跟前大话都不敢说一声的大姐,只能含含糊糊地告诉娘还没吃完饭呢。娘在电话的另一端跺着脚喊:“大过年的,肚子里也不缺,吃什么饭好几个小时,准是小三喝酒喝多了,我说的话都成了耳旁风了。”

知子莫若娘啊。那天一直到天黑我才和媳妇回到家,娘是又生气又心疼,一边数落大姐没有掌控好局面让我喝多了,一边熬绿豆汤给我解酒。

平日里,我每天都和娘通电话,娘总是能通过我的声音高低和欢快情绪准确判断我的生活状态。如果判断我心中遇到了难事、烦事,而我又没直接给她说,放下电话娘就开始忙了。她的手机上有按照1、2、3、4、5这些阿拉伯数字标识的我的哥、姐的电话,她会逐个打电话询问他们,最近和我联系了没有,是否了解我的状况,直到认为落实清楚了才罢休。

娘二次脑梗后,就不能说话了。我每次到病房,站在娘的病床前,无论我说什么,她都无法再吐出一个字同我互动了。我后来多次对身边的人说:“有爹娘的时候,好好珍惜,多陪他们说说话;早晚有一天,他们会离开我们的。到他们不在人世的时候,再想给他们说说话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望了。”

有娘的日子是幸福和快乐的,当儿女的时时刻刻都莫忘为娘的对儿女的那份苦心。“白头老母遮门啼,挽断衫袖留不止”,诗句写尽了母亲对子女的牵挂与不舍。只要能挤出时间,就请加快脚步,来到父母的身边,多陪陪他们吧。聆听娘的那些唠叨,因为那些唠叨里藏着娘的苦心,而那些苦心终有一天会随着光阴刻在你的心坎上、印到你的骨髓里。